

新刊兩件胡國銅鼎讀釋

黃錦前

最近,李學勤《胡應姬鼎試釋》〔1〕、《試說新出現的胡國方鼎》〔2〕(下文分別簡稱“李文 A”、“李文 B”)先後介紹和討論了兩件西周早期的胡國有銘銅鼎,這兩件器物都非常重要,小文擬在李文的基礎上對其談一些初步看法,請李先生和大家指正。

先說胡應姬鼎。胡應姬鼎為斂口方唇,下腹向外傾垂,圜底近平,雙立耳微外傾,三細柱足。頸飾兩道弦紋(圖一)。屬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鼎的Ⅳ型 3 式,〔3〕時代為西周早期後段。與陝西寶雞茹家莊 M1 出土的方耳圓鼎(BRM1 乙: 10)〔4〕及河南



圖一 胡應姬鼎



圖二 胡應姬鼎銘文

〔1〕李學勤:《胡應姬鼎試釋》,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第 109—11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李文未公布其器形、銘文圖片,有關材料只是在網絡上流傳。

〔2〕李學勤:《試說新出現的胡國方鼎》,《江漢考古》2015 年第 6 期,第 69—70 頁。該文亦未公布其器形、銘文圖片。

〔3〕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 29—31 頁,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4〕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圖版一五七-2,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平頂山應國墓地 M242 出土的旻鼎(M242:11)〔1〕等形制紋飾接近,爲昭王時器。

其內壁所鑄銘文(圖二)作:

唯昭王伐楚荆,胡應姬見于王,辭皇,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對揚王休,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

“唯昭王伐楚荆”,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2〕與本銘可對讀。銅器銘文中有關昭王伐楚的記載還有:

(1) 過伯簋〔3〕: 過伯從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2) 扶馭簋〔4〕: 扶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彝, 。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3) 壘簋〔5〕: 壘從王伐荆,俘,用作饜簋。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4) 諶鼎(鳩叔鼎)〔6〕: 鳩叔從王南征,唯歸,唯八月在誦空,諶作寶鬲鼎。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5) 諶簋(鳩叔簋)〔7〕: 唯九月,鳩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諶作寶簋。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6) 京師峻尊〔8〕: 王涉漢伐楚,王有繇〔9〕功,京師峻克匹王,釐貝,用作日庚寶尊彝,鬻。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7) 作册矢令簋〔10〕: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伯丁父既于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頂山應國墓地 I》彩版二二-1,大象出版社2012年。

〔2〕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45頁,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

〔3〕《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年;《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以下或簡稱“集成”)7.3907;旅順博物館:《旅順博物館館藏文物選粹·青銅器卷》12,第40—41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4〕集成7.3976。

〔5〕《文物》1959年第12期,第59頁;集成6.3732。


〔6〕集成5.2615。

〔7〕《文物》1986年第1期,圖版壹-6,第12頁圖二三;集成7.3950、7.3951。

〔8〕《文物》2010年第1期,第42頁圖一;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21卷,第253—254頁,第11784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吳鎮烽:《京師峻尊釋文補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7月26日, http://www.gwz.fudan.edu.cn/ SrcShow.asp? Src_ID=1908。

〔9〕詳參拙文:《京師峻尊讀釋》,未刊稿。

〔10〕集成8.4300、8.4301;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587頁,15,中華書局2004年;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5卷,五三,文物出版社1996年。

- 戍冀司訖，令敢揚皇王宜，丁公文報，用稽後人享，唯丁公報，令用深揚于皇王，令敢揚皇王宜，用作丁公寶簋，用尊事于皇宗，用饗王逆復，用芻僚人，婦子後人永寶， (雋)册。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 (8) 史牆盤〔1〕：宏魯昭王，廣讎楚荆，唯貫南行。 西周中期前段(恭王)
- (9) 逯盤〔2〕：零朕皇高祖惠仲盞父，調穌于政，有成于猷，用會昭王、穆王，盜政四方，翦伐楚荆。 西周晚期後段(宣王)
- (10) 趺鐘(宗周鐘)〔3〕：南國辰、孛，敢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翦伐厥都，辰、孛廼遣間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廿又六邦。 西周晚期後段(厲王)

可對讀。

“昭王”這種類似的稱謂金文習見，如利簋〔4〕之“武王”、內史亳同之“成王”〔5〕等，究竟是生稱還是死謚，學者間有不同看法，不贅述。本銘的“昭王”，與李文 A 認為係謚稱不同，我們認為應係生稱。

“胡應姬見于王”，李文 A 指出，胡應姬是嫁到胡國的應國之女，胡為歸(媿)姓，在今河南漯河東，與應國臨近，可從。

“辭皇”，李文 A 云“辭”是言辭，“皇”訓美，胡應姬朝見昭王，言辭甚美，因而得到王的贊許賞賜。恐未逮。《詩·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鄭箋：“辭，辭氣。謂政教也。”高亨注：“辭，指王朝政令之辭。”即特指王命。本銘的“辭”，或可如是理解。“皇”可讀作“暹”，即“將”，〔6〕訓為遵奉、秉承。《儀禮·聘禮》：“束帛將命于朝。”鄭玄注：“將，猶奉也。”史頌鼎〔7〕、史頌簋〔8〕“日暹天子覲命”、麥方彝〔9〕“用辭邢侯

〔1〕集成 16.10175；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5 卷，一九八，文物出版社 1996 年；曹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 646—653 頁，巴蜀書社 2005 年。

〔2〕《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3 期，第 10 頁圖一八；《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32 頁圖四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眉縣文化館編著：《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第 184—191 頁，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3〕集成 1.260；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5 卷，一八八，文物出版社 1996 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 853 頁，208，中華書局 2004 年。

〔4〕集成 8.4131。

〔5〕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 年第 2 期，第 30—33 頁。


〔6〕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第 405、436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7〕集成 5.2787—2788。

〔8〕集成 8.4229—4236；劉雨、汪濤：《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第 113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7 年。

〔9〕集成 16.9893。

出入運命”及蔡侯申歌鐘〔1〕、蔡侯申罇〔2〕“天命是運”等均可證。所謂“辭皇”，即遵奉王命，這是胡應姬此番覲見於王的重要內容。揆之上下文，並結合金文及文獻的有關記載來看，胡應姬的丈夫很可能是在此次伐楚的戰爭中死去，而新君尚未即位，因而才有此番胡應姬覲見於王的舉動。其夫雖死於伐楚的戰役，她代表胡國表示仍遵從周王的調遣，協同伐楚，即銘文所云的“辭皇”，因而得到昭王的賞賜。這是理解本銘的關鍵所在。

“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匹”字原篆作, 李文 A 釋作“乙”，非是。此從蔣玉斌釋。〔3〕

“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李文 A 認為“嫡君”與“公叔乙”係二人，分別指胡應姬之夫的正夫人和胡應姬之子，恐非。首先，若胡應姬為其夫的正夫人和其子作器，却不言及其夫，從邏輯和情理上來講皆難以講通。若此時其夫仍在世，則不大可能由胡應姬本人去覲見昭王，因此其夫此時當已亡故。換言之，銘文不提及其夫，而言其夫的正夫人和其子，於情於理皆不合。其次，若按李文 A 所言，“嫡君”係其夫的正夫人，公叔乙亦不當為胡應姬之子，而應係其夫。李文 A 所云理由是若公叔乙是“嫡君”的丈夫，他應該排在“嫡君”之前，其實未必。我們來看下面一組銘文：

- (1) 甬鼎〔4〕：遣伯作甬宗彝，其用夙夜享卣文神，用禱〔5〕祈眉壽。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甬哉，無害。
- (2) 甬盨(國博)〔6〕：遣伯作甬宗彝，其用夙夜享卣文神，用禱祈眉壽。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甬哉，無害。

〔1〕集成 1.210、1.211、1.217。

〔2〕集成 1.219—222。

〔3〕參見李春桃：《胡應姬鼎銘文試說》，文後跟帖，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43>。

〔4〕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38，第 147—149 頁，安徽美術出版社 2015 年。

〔5〕或認為此字應讀作“勾”，或可從。參見陳夢兮：《談遣伯盨銘文中的“勾祈”》，《考古與文物》2015 年第 6 期，第 80—81 頁。

〔6〕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39，第 150—158 頁，安徽美術出版社 2015 年。

- (3) 再簋(私人)^{〔1〕}: 遣伯作再宗彝,其用夙夜享卬文神,用禱祈眉壽。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音,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再哉,無害。
- (4) 再盨^{〔2〕}: 遣伯作再宗彝,其用夙夜享卬文神,用禱祈眉壽。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音,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再哉,無害。

這幾例銘文中的夫人皆排在丈夫之前,類似的例子金文中還有一些,不贅述。總之,李文 A 的說法不可信。

我們認為,所謂“嫡君公叔乙”應係一人,即胡應姬之夫。“君”謂君主,此指先君。“公”為尊稱。“叔”係排行,“乙”為日名。金文中類似的文例有:

- (1) 宗人鼎^{〔3〕}: 用為汝嫡彝器。
- (2) 晉伯卣^{〔4〕}: 晉伯作厥嫡宗寶彝。
- (3) 章叔將簋^{〔5〕}: 章叔將自作尊簋,其用追孝于朕嫡考。
- (4) 商尊(庚姬尊)^{〔6〕}: 商用作文辟日丁寶尊彝。
- (5) 南姑甗^{〔7〕}: 南姑庫乍厥皇辟伯氏寶鬻彝。
- (6) 孟姬卣簋^{〔8〕}: 孟姬卣自作饌簋,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

對照可知,“嫡君”與“公叔乙”係一人,應無疑義。

綜上,本銘是說昭王伐楚,途經胡國,胡應姬覲見昭王,表示要遵從周王的調遣、協同王師伐楚,昭王賞賜其貝十朋、玄布二匹,胡應姬為稱揚昭王的榮光,製作了用來祭祀先君公叔乙的祭器尊鼎。

下面接着討論伯麥方鼎(即李文 B 所云胡國方鼎)。

〔1〕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 11 卷,第 241—242 頁,第 05213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2〕 張懋鎔、王勇:《遣伯盨銘考釋》,載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一輯,第 133—139 頁,中西書局 2010 年;又輯入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第 49—54 頁,科學出版社 2010 年;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 12 卷,第 433—434 頁,第 05666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3〕 曹錦炎:《宗人鼎銘文小考》,載《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第 19—22 頁,吉林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4〕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中國古代青銅器》30,第 92—9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5〕 集成 7.4038。

〔6〕 集成 11.5997。



〔7〕 《考古與文物》2006 年第 6 期,第 64 頁圖九。

〔8〕 集成 7.4071、7.4072。

伯麥方鼎器形和銘文圖像未公布，〔1〕據李文 B 介紹，該鼎為扁足方鼎，無蓋，立耳，長方形淺腹，口沿下飾鳥喙夔紋，器底有四個鳥形扁足。屬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鼎的 I 型 5 式，〔2〕形制類似陝西寶雞竹園溝 M4 所出“伯作彝”方鼎 (BZM4:10)。〔3〕據上述鼎的形制和紋飾看，該鼎約為成、康時器；對照下文將要討論的太保玉戈來看，應係成王時器。

其銘文為：

唯公省，徂南國，至于漢。厥至于胡，公錫伯麥寶玉五品、馬四匹，用鑄官伯寶尊彝。

其中“麥”原篆作 (照片)，上部為鏽所掩。吳鎮烽釋作“麥”，據殘畫看，下从多，上部似从大，與許麥魯生鼎〔4〕的 字形近，暫釋作“麥”。

“唯公省，徂南國，至于漢”，“公”，李文 B 據大保玉戈銘推定係召公，可從。“徂”原作“馭”，李文 B 讀作“徂”，訓“往”，可從。“漢”指漢水，無疑義。金文中有散氏盤〔5〕“至于邊柳，復涉瀋，陟雩，馭(徂)遼隄以西，封于敝城”、梁十九年亡智鼎〔6〕“穆魯魯辟，徂(徂)省朔方”等可與之對讀。

“厥至于胡”，“胡”即胡國。李文 B 認為“公”省行的路綫可能是自今河南洛陽的成周出發，從而途經今河南漯河東的胡國，此路綫同昭王伐楚荆時的路綫基本一致。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不過單從銘文本身來看，恐未必(詳下文)。

“公錫伯麥寶玉五品、馬四匹”，“伯”下之字不清晰，李文 B 認為“伯麥”是方鼎的作器者，可從。從上下文來看，“伯麥”當為胡國的首領，應即上述胡應姬鼎“公叔乙”之父或祖。尹姑鬲〔7〕“錫玉五品，馬四匹”、應侯見工簋〔8〕“錫玉五穀，馬四匹，矢三千”、鄂侯馭方鼎〔9〕“王親錫馭方玉五穀，馬四匹”、鮮簋〔10〕“王賞裸玉三

〔1〕新近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著錄有該器器形和銘文圖像，參見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 1 卷，第 261—262 頁，第 0213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2〕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 16—17 頁，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3〕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彩版一五-1，圖版七四-1，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4〕集成 5.2605。

〔5〕集成 16.10176。

〔6〕集成 5.2746。

〔7〕集成 3.754, 3.755。

〔8〕《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續)——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第 123—127 頁，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1 年。

〔9〕集成 5.2810。

〔10〕集成 16.10166。

品、貝廿朋”、毛公鼎〔1〕“錫汝……圭瓚寶……玉環、玉琮……馬四匹……”等可與之對讀。

“用鑄宮伯寶尊彝”，“宮伯”，李文 B 認為“宮”是謚稱，並引《史記·蔡世家》的“宮侯”為證，恐未必。參照同時期有關銘文的“宮伯”來看，這個“宮伯”不是別人，正是銘文上述之“公”，即召公奭。在其他有關銅器銘文中，“宮伯”或稱“西宮伯”、“西宮”、“西”，對照可知，所指實即召公奭。〔2〕或以為此“宮伯”當為作器者伯參之祖考，恐未必。上揭諸器“遣伯作再宗彝”，遣伯與再即非親屬關係。又保員簋〔3〕：“唯王既燎，昏伐東夷。在十又二月，公返自周。己卯，公在虜，保員邇，辟公錫保員金車，曰：‘用事。’施于寶簋二，用饗公逆滄事。”保員作器，亦係為答謝賞賜者辟公。此二例均可為證。

綜上，方鼎銘是說召公省察南國，至漢水流域。途經胡國，賞賜伯參禮玉、馬匹等，伯參鑄作尊彝以志之並答謝召公。

大家都熟知的周初成王時著名的銅器保尊〔4〕和保卣〔5〕，其銘文曰：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蔑曆于保，錫寶，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

銘文的“保”即召公奭，此銘是說成王時召公奉王命巡視東國，與伯參方鼎銘可對讀，揭示了周初為確保東土和南土的穩定，對這些地區所採取的一些安撫策略。

與本銘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即上揭太保玉戈。〔6〕戈之年代，李學勤曾有詳細討論，認為屬周初成王前期，〔7〕可從。其銘文曰：

六月丙寅，王在豐，命太保省南國，帥漢，誕殷南。命曾侯辟，用龜走

〔1〕集成 5.2841。

〔2〕參看拙文：《“宮伯”、“西宮”考——兼談召公諸子銅器》、《由葉家山 M107 所出“西宮”銘文談曾國的族源問題》，未刊稿。

〔3〕張光裕：《新見保鼎銘試釋》，《考古》1991 年第 7 期，第 649—652 頁，拓本參見第 650 頁圖一；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二三四，第 94—9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集成 11.6003；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5 卷，一五九，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5〕集成 10.5415；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5 卷，一七二，文物出版社 1996 年；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二六四，第 160—16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6〕《考古與文物》1986 年第 1 期，第 71 頁圖二；《考古與文物》1993 年第 3 期，第 74 頁圖三。

〔7〕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載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第 5—10 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後輯入氏著《李學勤文集》第 209—214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 年。

百人。〔1〕

銘文自開頭至“誕殷南”等文字與伯參方鼎有關內容可對讀，仔細繹讀，這兩件銘文所述很可能為同一件事，而非李文 B 所云係召公兩次巡省。上揭李文 B 關於伯參方鼎“公”省行的路綫是自成周出發，同昭王伐楚荆時的路綫基本一致的有關推測恐不可從。上揭胡國在今河南漯河東，在漢水以北，然則伯參方鼎“厥至于胡”句就應該理解為召公在巡省漢水流域後，回程時途經胡國，因而有賞賜伯參等事。由此可見，召公此次巡省，去程和回程的路綫並不相同。據戈銘，去時自宗周出發，沿漢水而下；據伯參方鼎銘，回程途經胡國，則其很可能繞道成周，再回到宗周復命。或直接至成周復命，類似的情形見於昭王時期的靜方鼎〔2〕銘，作：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眾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

中和靜此番巡省南國，即係在宗周受王命，完成使命後復告於成周。

據太保玉戈銘可知，召公此行的使命，主要是“省南國”(下文云“殷南”，義同)。作為其重要內容之一，是冊命曾侯，即銘文所謂的“命曾侯辟，用龜走百人”。〔3〕據伯參方鼎銘可知，召公在回程時，途經胡國，召見其君伯參並賞賜禮玉、馬匹等，這也是其“省南國”或“殷南”的內容之一，最後再回到成周或宗周復命。其行程可由這兩篇銘文而大致勾勒復原。在周初封建屏藩的大背景下，成王初年，在南土地區封建親戚，〔4〕安撫諸侯，由此亦可窺見一斑。

穆王時期，與胡國有關的還有幾件銅器：

- (1) 泉簋(泉屋)〔5〕：伯雍父來自胡，蔑泉曆，賜赤金，對揚伯休，用作文祖辛公寶鬯簋，其子子孫孫永寶。
- (2) 竅鼎〔6〕：唯十又一月，師雍父省道至于胡，竅從，其父蔑竅曆，錫金，對揚其父休，用作寶鼎。
- (3) 邁甗〔7〕：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師，邁從師雍父，肩使

〔1〕“曾”、“龜”等字的改釋詳參拙文：《曾國始封的新證據——重讀太保玉戈銘》，未刊稿。

〔2〕《文物》1998年第5期，第85頁圖一，第86頁圖四。

〔3〕參看拙文：《曾國始封的新證據——重讀太保玉戈銘》，未刊稿。

〔4〕關於曾國的族源，詳參拙文：《由葉家山 M107 所出“西宮”銘文談曾國的族源問題》，未刊稿。

〔5〕集成 8.4122；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 11 卷，第 49—50 頁，第 05115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6〕集成 5.2721。

〔7〕集成 3.94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 659 頁，48，中華書局 2004 年。

邁使于胡侯，侯蔑邁曆，賜邁金，用作旅甌。

結合有關銅器銘文來看，師雍父（或作“伯雍父”）此次“肩使邁使于胡侯”、“省道至于胡”，其主要任務是征伐淮夷。^{〔1〕}如同上述胡應姬鼎云昭王伐楚時胡國協同王師作戰一樣，胡國在此次征伐淮夷的戰爭中亦承擔協同、配合王師的任務。

胡應姬鼎開頭即云“唯昭王伐楚荆”，據文獻和出土材料可知，康王以後，荆楚勢力逐漸崛起，周初至成王時南土的安定局面逐漸被打破，至昭王時，楚與周王朝的關係日趨緊張，文獻及銅器銘文中常見有關雙方兵戎相見的記載，即是這一歷史背景的反映。^{〔2〕}連年伐楚，王師不斷失利，昭王被迫親自南征，即胡應姬鼎所言之“唯昭王伐楚荆”及京師峻尊的“王涉漢伐楚”，但最後結果亦以王師潰敗、“昭王南征而不復”溺死於漢水而告終。胡應姬鼎銘所記，即昭王溺於漢水之前不久、伐楚過程中途經胡國的情形。

另外，或據有關文獻記載認為兩周時期胡有歸姓、姬姓之別，歸姓胡國在汝陰，今安徽阜陽一帶，姬姓胡國在鄆城，今河南漯河東。^{〔3〕}但正如裘錫圭所言，“關於姬姓之胡的史料，實際上是不充分的”，“鄆城和阜陽很可能是歸姓之胡先後所居之地，並非一為姬姓之國，一為歸姓之國”。^{〔4〕}今據胡應姬鼎與伯參方鼎銘，亦可證明西周早期的歸姓胡國確應在今漯河東，而非遠在阜陽一帶，歸姓胡國在汝陰、姬姓胡國在鄆城的舊說實誤。

最後對本文所論略作總結：本文對新近公布的胡應姬鼎和伯參方鼎作了進一步討論，認為二器年代分別屬昭王末年和成王初年。胡應姬鼎的“辭皇”之“皇”可讀作“將”，“辭皇”即遵從王命；“嫡君”與“公叔乙”應係一人，即胡應姬之夫。伯參方鼎的作器者“伯參”為胡國首領，係胡應姬鼎“公叔乙”之父或祖。伯參方鼎與太保玉戈銘所記很可能為同一件事，而非召公兩次南巡。召公巡省的去程和回程的路綫並不相同，去時自宗周出發，沿漢水而下，回程很可能繞道成周，或直接至成周復命。這兩件鼎的銘文是周初至昭王時期周王朝與南土關係的見證，直接或間接反映了周王室與荆楚之間關係逐漸惡化而至兵戎相見的過程，是彌足珍貴

〔1〕 拙文：《師雍父諸器繫聯研究》、《再器及相關銘文繫聯研究》，未刊稿。

〔2〕 拙文：《荆子鼎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楚系銅器銘文新研》第64—66頁，吉林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12年。

〔3〕 主要見於《路史·國名紀丁》“胡國”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八年》（中華書局2009年）及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15頁）等。

〔4〕 裘錫圭：《說彘簋的兩個地名——棧林和胡》，載《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1983年；後輯入氏著《古文字論集》第386—392頁，中華書局1992年；又輯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33—3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的史料。同時亦可證明西周早期的歸姓胡國確應在今漯河東,而非遠在阜陽一帶,歸姓胡國在汝陰、姬姓胡國在鄆城的舊說實誤。希望小文所論,能起拋磚引玉之效。

(黃錦前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副教授)

